

中国网络 行动十年

动因、过程与影响

丁方舟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本书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问题系列丛书》项目资助出版

中国网络行动十年

动因、过程与影响

丁方舟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网络行动十年：动因、过程与影响/丁方舟著.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 5
ISBN 978-7-5043-7669-5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互联网络—传播媒介—
研究—中国 IV. ①G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8573号

中国网络行动十年：动因、过程与影响

丁方舟 著

策 划：刘 媛 倪彤彬

责任编辑：周 玲

封面设计：海燕·贝壳悦读

出版发行：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100045

网 址：www.crtp.com.cn

电子信箱：crtp8@sina.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185 (千) 字

印 张：14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43-7669-5

定 价：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致 谢

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

三年在浙大的读博时光，最幸运的是能够拜入导师韦路教授门下，在恩师的言传身教下，学习一门叫作“如何做研究”的手艺。特别感谢恩师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一直以来的指导、点拨与帮助，也感谢同门的师弟师妹与同班同学们，激励着我不断反思性地看待自己身上的诸多缺点，从而不致懈怠太多。

感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院长吴飞老师一直推荐和带领我们阅读各种经典著作，使我接触到社会学的广阔视野，也感谢吴老师在课堂以外的多番帮助。感谢宾大访学期间杨国斌老师给予的指点，杨老师课上的许多阅读材料后来都成为了本书的文献基础。感谢李岩老师每周的快乐读书会，两年的时光有幸细细领略了霍尔、福柯与巴尔特的风采。感谢李红涛老师在我学术入门阶段的点拨，怎样设计研究计划，怎样做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都是在李老师的课堂上有了初次领会，也感谢李老师多次推荐“好玩”的文献。感谢潘忠党老师历时三年的暑期课堂与研修班，潘老师在家国问题上的学术关怀令人敬佩。感谢沈利江老师在连续两年的暑期课堂上系统地教授我们量化研究方法。感谢李东晓老师在申请富布赖特项目时给过我的建议，正是这个项目让我有机会在美国顶尖学府进行访学，也正是在宾大访学期间，我完

成了本书的大部分撰写工作。感谢邵培仁老师、李杰老师、章宏老师、汪凯老师、高芳芳老师在读博期间的传道、授业与解惑。特别感谢硕士与本科阶段的恩师郭中实老师与程大荣老师的一路鼓励。

三年读博，除了幸运地遇到优秀的老师与同学以外，也有幸接触到更多揭示世界如何运作、社会如何建构的文本，有如探秘一般，点亮黑箱的一个个角落。这是读博期间的另一个重要收获，也激励我想要做出更像样的研究，探秘那些不甚明朗的角落。

丁方舟

2016年1月31日

序 言

本书对 2003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网络行动的动因、过程与影响进行了解释与阐释，并着重探讨了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将社交媒体视作行动者展开符号化权力关系博弈的场域，将网络行动视作这一场域中的实践，本书采用历时性变迁的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内容分析、话语分析与框架分析的方法，探讨 2003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网络行动中作用的多维动因以及这些动因的历时性变迁何以影响到网络行动的政治机会、动员结构与话语机会；分析多元行动者在网络行动过程中何以通过框架建构、话语实践及意义争夺展开符号化的权力关系博弈；揭示十余年间中国网络行动带来的政治、社会心理与文化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意在阐明新媒体传播与社会变迁之间互为形塑的关系。

研究发现，转型期的社会变迁是中国网络行动产生的前置结构动因，而作用于网络行动动员过程的主要动因有：（1）中国互联网政策的演变和社交媒体场域规则变迁带来的政治机会增加；（2）线上社会网络形塑的动员结构；（3）行动者通过策略性运用利益诉求、历史文化、情感元素等符号资源创造的话语机会。因此，社交媒体并非导致网络行动产生的决定性自变量，而是网络行动展开的行动场域，是上述动因与网络行动之间的中介变量。社交媒体场域的规则与结构不仅制约着网络行动产生的政治机会，影响着行动

动员与扩散的线上社会网络基础，更为多元行动者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与话语机会。网络行动的过程是多元行动者围绕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展开互动与博弈的过程。本书从中区分出四类主要的行动者角色：倡导者、参与者、积极旁观者与反行动者，分析了他们在行动过程中何以利用框架建构、话语实践与意义争夺来塑造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及其惯常使用的行动剧目何以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更替而变迁。在网络行动的影响方面，本书发现，十余年的中国网络行动并未促使多元行动者对于中国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达成共识，反而催生了行动者之间意见极化与政治犬儒主义的倾向，激化了中国转型社会的负面社会情绪，并加剧了传统性价值观与现代性价值观之间的张力。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场域已然成为多元行动者自我呈现的公共舞台，因而网络行动也体现出更多的表演性，即行动者对文化符码与情感元素的运用并不一定出自本真性目的，而是有可能出自争夺优势性符号权力的策略性目的，但表演性行动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其他行动者是否相信其本真性。

在理论贡献方面，通过将社交媒体视作网络行动展开的行动场域，将网络行动视作这一场域中的实践，本书从“场域—实践”的角度阐释了社交媒体与网络行动之间互为形塑的关系。由此，本书超越了现有研究的技术决定论视角，转而采纳社会塑造论的视角，将网络行动当作更广阔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实践来加以考察，从而在社会行动的分析框架中解释并阐释了中国网络行动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发展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再者，本书探讨了基于社交媒体场域的网络行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的不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基于中国情境的经验数据与理论启示。最后，本书以网络行动作为切入点，历史性地透视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权力关系的变迁，探讨了新媒体传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新媒体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理论视野。

目 次

1 研究问题 / 001

2 理论框架 / 005

2.1 网络行动与权力关系 / 005

2.2 网络行动的动因 / 006

2.3 网络行动的过程 / 013

2.4 网络行动的影响 / 018

3 研究方法 / 021

4 网络行动的动因 / 027

4.1 网络行动的历史动因：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 / 027

4.2 网络行动的政治机会：

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中国互联网政策 / 038

4.3 网络行动的动员结构：线上社会网络 / 048

4.4 网络行动的话语机会：利益诉求、历史文化与情感元素 / 061

5 网络行动的过程 / 072

5.1 网络行动中的行动者：

倡导者、参与者、积极旁观者与反行动者 / 072

5.2 网络行动的行动意义：框架建构、话语实践与意义争夺 / 083

5.3 网络行动的行动剧目：

基于社交媒体场域变迁的历史性考察 / 093

6 网络行动的影响 / 102

6.1 网络行动的政治影响：意见极化与政治犬儒主义 / 102

6.2 网络行动的社会心理影响：

社会情绪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 109

6.3 网络行动的文化影响：作为表演性行动的网络行动 / 113

7 结 论 / 122

附录1 社会塑造论 / 131

附录2 作为政治舞台的社交媒体 / 176

附录3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网络行动研究 / 188

参考文献 / 197

研究问题

“传播领域，包括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络，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卡斯特，2011）。21 世纪以来，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社会分层与利益分配不均等结构化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心理趋向多元化，社会权力关系也呈现出纷繁的面貌。与此同时，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新信息与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大规模创新催生了一种新的媒介形式——社交媒体。在此情境下，社会权力关系的变迁与社交媒体的核心特征——传播内容、传播网络及传播关系的多元化结合在一起，合力形塑了一个各类行动者和多种话语交织其间的社交媒体场域。在此场域内，权力关系博弈得以展开的基础就是网络行动（Internet Activism）。

本书旨在对 2003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网络行动的动因、过程与影响进行解释与阐释，并重点探讨作为场域的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由此，本书将处理两个核心的研究对象：其一，网络行动；其二，社交媒体。已有研究在探讨这两者的关系时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逻辑，例如，政治传播研究习惯将社交媒体使用处理为引发网络行动的决定性动因之一，进而检验作为自变量的社交媒体使用与作为因变量的网络行动参与之间的影响关系，但这

样就悬置了网络行动产生的社会情境，行动者的能动性也被隐匿在社交媒体使用这一过于模糊的变量中。而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社交媒体又常被简单地处理成一种用以辅助网络行动产生、动员及延续的工具，如此不免缺乏历史维度的分析，忽略了社交媒体场域的历史演变与网络行动、权力关系等动态变迁间互为形塑的关系。

由此，本书主张，首先应当超越传播学仅仅将网络行动视作传播实践的藩篱，引入更多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将网络行动当作更广阔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实践来加以考察，不再彼此孤立地看待网络行动与社交媒体，而是将社交媒体视作行动者展开权力关系博弈的行动场域，将网络行动视作这一场域中的实践，进而从“场域—实践”的角度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重新回到社会行动的分析架构中，尤其是将行动者及其策略性的意义建构行动带回网络行动的研究视野中，这正是韦伯所主张的，不仅要“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还要“对社会行动进行阐释性的理解”（Weber, 1921）。这就需要明确，行动者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行动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但个体的能动性也是有限的，其行动逻辑必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换言之，多元行动者在参与网络行动时受到所在行动场域规则的左右，但他们仍然能够建构有关自身、行动及所在环境的意义，形塑行动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成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Melucci, 1989）。正是在此意涵上，本书也将聚焦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结构与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的关系（Sewell, 1992）。

本书的目的是考察 2003 年至 2014 年期间基于社交媒体场域的中国网络行动。之所以要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研究网络行动，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揭示网络行动的动因、过程与影响本身，更重要的在于通过揭示行动者关系的历史演变来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权力关系的动态变迁。本书主张，网络行动是多元因素形塑的社会实践，社交媒体是这一实践得以展开的行动

场域，因而，网络行动既受到场域规则的制约，又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场域即自成一套体系的社会空间，一组互为依附的社会网络关系（Boudieu，1984），这种关系是由场域规则以及行动者的实践得以建构的。在社交媒体场域中，形塑这种关系变迁的关键性实践就是网络行动。在网络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利用其掌握的符号资源参与符号权力的建构过程，推及有利于己方的框架、话语及意义，以得到自身所在利益群体的呼应，与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联盟、协商甚或冲突，从而在动态的场域结构中维护、挑战或重塑符号化的权力关系（徐桂权 & 任孟山，2010）。这一符号化的线上权力关系，既是线下权力关系的部分再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社会整体权力关系变迁的方向。概言之，社交媒体场域的创新沿革、网络行动的历史演变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动态变迁之间始终互为形塑。

在此基础上，本书将采用历时性研究的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框架分析等研究方法，以2003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社交媒体场域发生的网络行动作为经验数据的来源，重点解决以下研究问题：网络行动的产生与动员受到哪些多维动因的作用？社交媒体场域的动态变迁何以形塑了网络行动的政治机会、动员结构与话语机会？在基于社交媒体场域的网络行动中作用着哪些行动者，他们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何以通过网络行动这一实践来维护、挑战或重塑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这一过程何以通过持续不断的意义协商得以完成，多元行动者在此过程中运用了哪些指向利益诉求、历史文化与情感元素的符号资源，从而建立网络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倡导或参与网络行动的倾向何以影响着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转变？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情绪与社会价值观产生了何种形塑作用？网络行动的表演性又产生了何种文化影响？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书首先致力于超越已有研究的技术决定论视角，转而采用社会塑造论的视角（有关社会塑造论的理论含义详见附录1），将社

交媒体视作网络行动得以展开的行动场域，将网络行动视作这一场域中的实践，从而在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中考察网络行动的动因、过程与影响；其次，网络行动研究承继自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与抗争政治研究，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有关其动因、过程、影响的解释都存在理论适应性的问题，因此本书将提供基于中国情境的经验数据，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解释。最后，本书将以网络行动作为切入点，历史性地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权力关系的变迁，从而为传播学中的“新媒体传播—社会变迁”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启示。

理论框架

2.1 网络行动与权力关系

网络行动是“通过网络和其他新兴通讯技术展开的抗争性活动”（杨国斌，2013）。在政治社会学的范畴里，抗争指的是“对他人提出涉及利益的要求”（Tilly & Tarrow, 2007）。然而，抗争并不必然直接针对政府，而是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有关。在韦伯的定义里，权力即某一关系中的行动者有多大可能推行自己的意志，行动者对权力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必然存在竞争、冲突和选择，因而，权力关系意味着一种支配性关系（Weber, 1946）。换言之，抗争性行动是行动者为了在权力关系中获得平衡或优势性地位而发起的行动。与此同时，蒂利和塔罗（Tilly & Tarrow, 2007）在定义“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时特别强调，政府在抗争性行动中或是作为被行动者要求的对象，或是提出要求的行动者，抑或作为第三方介入其中。这一定义对本书具有重要的启示，即政府不一定是被抗争的对象，而是同样可以作为行动者发起和参与网络行动。

以上论述对本书探讨基于社交媒体场域的中国网络行动尤为重要。过往研究总是倾向于将政府与公民对立起来，在“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逻辑下，

理所当然地认为网络行动是公民针对政府等公权力部门展开的抗争性行动。然而，运用互联网已然成为各类行动者的标准化实践（McNair，2012）。除公民以外，政府、媒体、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同样会利用其掌握的符号资源展开网络行动，以期维护在权力关系中的固有地位，或在变动的权力关系结构中争取优势性地位。因此，网络行动事实上是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展开，相关研究应当考察的不仅仅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挑战或抗争，而是各类行动者围绕权力关系展开的互动与博弈，以及他们何以反思性地（reflexively）调适其行动策略。

在这方面，杨国斌（2013）提出的网络行动多元互动分析路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论强调“促进和限制网络行动的多维互动”，这些多维因素包括国家权力、文化、市场、公民社会以及跨国行动，而网络行动正是这些力量间动态互动的典型形式（杨国斌，2013）。该分析框架主要通过探讨网络行动与上述方面的互动来展开讨论，符合当代社会理论从关系性、互动性及情境化视角来解读社会现象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增加历史维度的分析以及基于中国社交媒体场域的新的经验数据，也就是从影响网络行动的多维因素之历史变迁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网络行动的动因、过程与影响。

2.2 网络行动的动因

本书将首先聚焦网络行动产生和动员过程中作用的多维因素，即网络行动的动因。网络行动研究承继自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与抗争政治研究，虽然网络行动在当前新的时空语境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经验数据与理论启示，但经典理论仍然能够为我们理解网络行动的动因提供有益的借鉴。有一点必须首先明确，社会行为很难存在归并性的原则，社会科学在观察人们的行为时最难的莫过于探索人类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Cohen，

1996)。同样,影响抗争性行动产生和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也不存在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因此很难找到一个指导性的模型,对单个或多个社会运动做出统一的解释与预测(赵鼎新,2012)。但政治社会学围绕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动员仍然形成了三大经典理论: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与框架过程(Framing Process)(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从理论前提来说,它们都强调社会运动是一个政治过程,行动者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选择发起或参与行动,但它们各自的切入点却有所不同(Walder, 2009)。

政治机会理论强调,政治机会和限制的多寡是开启社会运动可能性的关键。所谓的政治机会是指较为常规的、相对稳定的(但非恒久不变的)、能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程度的政治环境(Tarrow, 1998),通常包括国家政策的开放或收紧,政治参与渠道的多元程度,精英联盟的稳定或分化程度,政治联盟的出现,国家的控制能力与倾向等(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 Tarrow, 1998)。与之相区别,动员结构是指促使行动者组织和参与行动的社会结构及其运用的抗争行动剧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其中社会结构包含正式的社会运动组织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等,行动剧目则指向行动者熟悉并能够运用的行动方式(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动员结构理论尤其强调社会运动的发生是一个短期的资源动员过程,社会运动组织越专业化,行动者可利用的时间、金钱、社会网络等资源越多,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产生的运动规模也越大,同时更容易获得成功(McCarthy & Zald, 1977)。不难发现,这两大理论的经验数据主要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运动,与中国情境格格不入,更不必说社交媒体大规模发展以来,网络行动的逻辑已然区别于传统社会运动中集体行动的逻辑(Bennett & Segerberg, 2012),但有三点仍然值得注意:其一,抗争性行动发生的机会会受到所在政治环境等结构化因素的影响;其二,行动者借由社会网络等资

源实现行动的动员和组织过程；其三，根据相应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结构，行动者将采用他们熟悉并能够运用的行动剧目。

如果说政治机会和动员结构理论一旦进入他国语境就存在普适性的问题，那么框架过程理论在这一点上明显具有更好的适应性。1980年以来，学者开始更多关注框架、话语、身份认同等在塑造行动者共识时的不可或缺性。框架过程理论强调，纵然存在政治机会，但如果行动者无法通过行动意义的彰显意识到这一点，社会运动依然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行动机会并非仅由国家层面的结构性政治变化引发的，更是经由行动者的策略性框架过程创造出来的（Gamson & Meyer, 1996）。因而，框架过程就是通过策略性地运用符号、框架、话语等资源来进行意义协商与建构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框架建构是一种“策略性行动”（strategic action）（Pan & Kosicki, 2001）。在此过程中，行动者运用框架桥接、框架扩大、框架延伸、框架转移等策略建构有关世界、行动和行动者本身的意义，以此获得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动员更多行动者的参与（Snow & Benford, 1988；Snow & Benford, 1992；Benford & Snow, 2000）。概言之，框架化的目的就是正当化，并以共享的文化符码来动员行动者的参与（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框架过程是高度符号化和话语化的，所以，以此塑造的并非一种结构化的行动机会，而是一种框架化的、行动产生不可或缺的话语机会（Gamson & Meyer, 1996）。话语机会不仅关系到行动的产生，更与行动的扩散密切相关，其中议题传播的可见程度（visibility）、共鸣程度（resonance）及合法性程度（legitimacy）显著影响着行动的动员、扩散与延续（Koopmans, 2004）。

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的社会运动理论虽然在目前占据主导性地位，但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更多是从情感角度来解释集体行动产生的原因。勒庞（Le Bon, 1897）认为，人在独处时是理性的，但一旦聚集到一起，随着聚